

冬必武同志 早期在武汉的革命活动

张 光 宇

英宏的武汉，是冬必武同志早期战斗过的重要地方。在这里，他为追求革命真理，创造共产主义小组，建立和发展湖北省的党组织和革命统一战线，开展工农运动，巩固无产阶级的革命领导权，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

—

冬必武同志又名冬用威，一八八六年三月五日出生在湖北省黄安县城一个贫穷的教员家庭。他从小勤奋学习，十六岁考中了秀才。当时，祖国内忧外患，正处在危急存亡之秋，为了救国救民，他毅然抛弃了旧的科举和功名，到武汉来上新学。一九〇五年，他考入了湖北文普通学塾，并成为学习最优秀的学生。学塾附近恰好是革命团体“日知会”活动的场所，在那里，他阅读了《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等反满书笈和《新民丛报》等宣传维新的刊物，立下了推翻清政府黑暗统治的革命志向。

一九一一年十月，冬必武同志正在黄州贵府中学任教的时候，辛亥革命爆发了。他满怀革命激情，立即赶到武昌参加起义，先后在军需处和财政处任职，加入了同盟会，并组织同盟会湖北支部，担任评议员。辛亥革命的果实被袁世凯窃取后，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新的反袁怒潮。冬必武同志在武汉组织反袁起义失败，东渡日本，入政法大学学习，加入了孙中山先生组织的中华革命党，继续坚持斗争。一九一五年，日本反动政府向袁世凯提出签订卖国的“二十一条”，激起中国留学生的强烈反对。他奉命回国，秘密从事反袁活动，不幸被捕入狱，直到一九一六年袁世凯死后才出狱，再次去日本政法大学学习。在日本留学期间，冬必武同志开始阅读马列主义书笈，新的思想在他的脑海中激荡着，滋长着。一九一七年俄国二月革命，又给他以强烈的影响。他以新的战斗姿态，从日本回国，到利川县的鄂西靖国军中做秘密工作，参加护法战争。

一九一九年的早春，冬必武同志来到上海。不久，五四运动爆发了，革命的新思潮象不可阻挡的洪流席卷中国大地。俄国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对一个经历了千辛万苦、不断探索革命真理的先进的中国人来说，该是多么巨大的喜讯啊！他阅读了所能找到的一切日文本、英文本的马克思主义著作，迎着新世纪的曙光，日夜思索着：革命究竟是为哪一个？革命怎样才能成功？他经常和朋友们讨论中国革命的新

策略和新方法，感到过去革命工作不依靠工农群众，方向不对，需要从头做起。

这一年的冬天，董必武同志回到武汉，计划办报纸、办学校，宣传马克思主义，培养干部，做发动革命的准备。一九二〇年初，他创办的武汉中学开学了。在董必武和陈潭秋同志的领导下，武汉中学成了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基地，《共产党宣言》、《俄国新经济政策》等马列著作，和《湘江评论》、《新青年》、《共产党》、《武汉星期评论》等革命刊物，以及武汉中学自编的《政治问答》、《武汉中学周刊》在学生中广泛流传着。

既要革命，就要组织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一九二〇年秋，董必武同志接到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提议组织湖北共产主义小组的来信后，便立即同陈潭秋同志开始筹备工作。九月的一天，董必武同志和陈潭秋同志等五人，在他的家里，举行了武汉共产主义小组的成立会。会上，报告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经过和组织机构，讨论了中国共产党组织大纲草案，选举了小组负责人，宣告了武汉共产主义小组的诞生。为了避免敌人的注意，共产主义小组机关设在湖北警厅背后的武昌山前多公祠五号，外面挂起律师事务所的牌子作掩护。律师事务所和武汉中学是当时秘密进行革命活动的中心。

武汉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经历了一场共产主义者反对无政府主义者的激烈论战。董必武同志坚决捍卫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政党的学说，批判了无政府主义的反动思潮。为了深入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培养革命骨干，他又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把五四运动中涌现出来的一批先进知识分子和各校进步青年学生，分别组织起来。共产主义小组的许多活动，都是以这两个组织的名义来进行的。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主编的《武汉星期评论》上，董必武同志经常写文章，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以马克思主义观点评论中国社会问题，指导学生运动、工人运动和妇女解放运动。在他的领导下，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深入工人群众，用了一个月左右的时间，调查了武汉工人的分布，男女童工和工资状况，写出《武昌五局工人状况》和《汉口苦力状况》两篇调查报告，制定了从事工人运动的计划。共产主义小组帮助了武汉人力车工会的成立，领导了一九二一年三月汉口人力车夫的罢工斗争，在武昌第一纱厂、汉口英美烟草厂、汉阳兵工厂、裕华纱厂举办工人识字班。武汉中学也在彭公祠办起了“贫民夜校”，董必武同志亲自讲课，向工人群众宣传革命思想。武汉共产主义小组在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道路上，大踏步地前进着。

一九二一年的夏天，董必武同志和陈潭秋同志代表武汉共产主义小组，去上海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时刻，董必武同志站在毛主席正确意见一边，反对了“合法马克思主义”和关门主义两种错误观点，为建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中国共产党，作出了重大贡献，成为我们党的创始人之一。

二

党的“一大”以后，董必武同志和陈潭秋同志回到武汉，负责建立和发展湖北省党的组织。武汉共产主义小组改组为中共武汉地方委员会，下辖汉阳、汉口、武昌、江岸、徐家棚五个支部，党员发展到五十多人，董必武同志担任地委书记。

为了迅速把党的组织发展到全省各地，董必武同志以武汉中学为基地，培养来自各县的革命青年学生入党，然后派回各县发展地方党的组织。一九二三年冬，黄安学生

党员组成党的黄安工作组，返回黄安，于一九二五年秋在七里坪建立了中共黄安特别支部。一九二四年，麻城笈学生党员也组成党的麻城工作组，于一九二五年冬，建立了中共麻城特别支部。在李必武同志和武汉地委的领导下，黄冈、黄陂、黄梅、大冶、沔阳、监利、荆门、鹤峰、咸丰、来凤等县都先后建立了党的组织。

随着各地党组织的建立，武汉的工人运动蓬勃发巳，掀起罢工高潮，湖北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逐步发动起来。“二·七”惨案发生后，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任务更加迫切地提到议程上来。一九二四年，我们党同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国民党正式建立了革命统一战线。李必武同志紧紧抓住这个重要环节，根据党的指示，以国民党在湖北的联络员的身分，负责建立湖北省国民党的组织，积极开展革命统一战线工作。在他的主持下，汉口特别市成立了国民党临时支部，有十七个县建立了国民党的组织。一九二五年七月，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全省代表大会，成立了省执行委员会，李必武同志当选为执行委员。在统战工作中，他始终坚持团结左派、争取中间派、反对右派的正确方针，十分注意以共产党员为骨干，把国民党改造成成为以工农群众为基础的革命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保证了无产阶级的革命领导权。同时，还发动各界群众，成立了湖北学生联合会、湖北青年团体联合会、湖北工商联合会、国民会议湖北促进会、湖北省教育会、湖北妇女协会、各法团外交后援会、武昌律师公会等团体，在党的领导下，形成广泛的统一战线。

在革命统一战线建立和发巳的新形势下，湖北的革命运动日益高涨。一九二四年八月，中共武汉地委发出收回租期巳满的汉口英租界的号召，得到武汉各民众团体的热烈响应。九月五日，武汉反帝大同盟正式成立，李必武、陈潭秋同志当选为执行委员。九月七日，在武汉反帝大同盟的组织下，各校学生和广大群众参加了武昌阅马场举行的反帝示威游行。一九二五年初，李必武同志根据党的“四大”关于农民运动决议案的精神，组织共产党员深入各县农村，开展农民运动。黄安、黄冈、黄陂、黄梅、汉川、汉阳、沔江、天门、枣阳、阳新等县，纷纷建立农民协会，农民运动逐步发巳起来。十月，李必武同志主办的《楚光日报》出版了，共产党员宛希俨同志担任主编，利用合法地位，揭露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宣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思想，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

一九二六年一月，李必武同志去广州出席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是在革命统一战线内，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斗争日益尖锐的形势下召开的。他积极参加了毛主席领导的反对国民党右派的斗争，为捍卫无产阶级的领导权，进行了英勇的战斗，并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候补委员。

那时，李必武同志还是中共武汉地委的军委书记。这次大会后，他于三月间到了长沙，在直系军阀赵恒惕的第四军军长唐生智部，以国民党代表的身分，做统战工作。由于工作获得成功，唐生智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参加了北伐战争。五月，他回到武汉后，继续在直系军阀刘佐龙部从事秘密的军事工作。七月，他组织湖北各界代表团到长沙欢迎北伐军。八月下旬，以叶挺独立团为前锋的第四军，发起汀泗桥战役，他不畏艰险，深入战区，领导共产党员，发动工农群众，支援北伐军作战。工农群众组成担架队和工程队，送茶送饭，引路带仗，抢救伤员，构筑工事，破坏敌后铁路，切断电线，直接参战，配合国民革命军夺取了汀泗桥战役的胜利。九月初，北伐军攻占汉口和汉阳后，直系军阀残部两万余人据守武昌孤城，负隅顽抗。李必武同志又领导地下党员，发

动群众，对敌军已开强大的政治攻势，里应外合，配合北伐军攻占了武昌。

三

北伐军攻占武昌以后，武汉成为当时革命的中心。在毛主席为代表的我们党的正确路线指引下，董必武同志为巩固和发展大革命的胜利，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

一九二六年秋，我们党以国民党的名义，创办了《民国日报》，由董必武同志担任经理，沈雁冰同志任主编。《民国日报》和继续出版的《楚光日报》，公开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揭露和声讨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土豪劣绅的罪恶，揭露和批判国民党右派破坏革命的阴谋活动，在全国有很大的影响。

十二月间，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科学学生由广州迁来武汉后，董必武同志被聘请为特别讲习人，为中国革命培养军事政治人才。十二月二十日，董必武同志在汉口新市场召开的农工商学各团体代表大会上发表演说，向国民政府提出“严惩土豪劣绅”、“限期肃清土匪”、“禁绝鸦片”、“严禁妇女缠足”等十项要求。大会议决成立全省农工商学联合会，把各界群众进一步组织起来，开展反帝反封建的斗争。

一九二七年一月四日，武汉工人阶级和广大群众，在党的领导下，收回了汉口英租界，大灭了帝国主义的威风。一月七日，董必武同志在武汉二十万群众举行的反英大会上发表演说，强调指出：“汉口英租界虽已收回，但束缚我们的不平等条约还多，英帝国主义更为仇视我们，我们还要集中力量与它斗争到底。”在这场斗争的推动和影响下，全国各地收回租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斗争，更加广泛深入地发展起来。

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当时，以湖南为中心的农民大革命，正在波澜壮阔地向前发展，猛烈地冲击着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统治的基础。董必武同志坚定地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反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大力支持和发动农民运动。他当时担任中共湖北省委员会委员和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常委，把许多共产党员以农运特派员的名义，派往各地农村，发动农民，武装农民，掀起了湖北农民运动的高潮。

农民运动的迅速发展，迫切需要大批农运干部。一九二六年冬，毛主席向湖北省党部提出在武昌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建议。董必武同志积极响应，于十二月十五日主持召开国民党湖北省第三届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推定陈荫林同志等三人担任农讲所筹备委员，规定学生名额为二百人、经费一万六千元。会后，又函请省政务委员会拨给前立法政学校为农讲所校址，使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学生于三月间按期开始上课。

为了镇压土豪劣绅的破坏活动，一九二七年三月初，董必武同志主持省党部拟定了《湖北省惩治土豪劣绅条例》和《审判土豪劣绅委员会条例》，提交国民党三中全会批准施行。同时，省党部会同省农协、省政府、省总工会、省学联、省妇协、省商协的代表，联合组成省审判土豪劣绅委员会。三月四日，湖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开幕。这一天，武汉各界为庆祝农代会的召开，在阅马场举行三十万人的群众大会，董必武同志在大会上发表演说，热情赞扬和坚决支持农民运动。省农代会召开期间，黄安土豪劣绅猖狂反扑，董必武同志急令王健同志回黄安，组织农民武装，把他们的反革命凶焰打了下去。董必武等同志的工作，受到毛主席的热情赞扬。三月十八日，毛主席在全国农民运动委员会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联合举行的欢迎鄂、湘两省农民代表的大会上，指出：农民

利益与地主利益冲突，在湖北一派国民党同志主张农民利益，我们要打倒土豪劣绅就要援助这派主张农民利益的。

一九二七年五月，麻城县土豪劣绅勾结河南光山县的地主武装红枪会，发动反革命暴乱，围攻麻城县城，情况十分危急。中共麻城特别支部派王树声同志前来武汉求援。李必武同志立即召开省党部、省政府、省农协联席会议，决定组织“麻城惨案调查委员会”，急调在黄安剿匪的革命军队一个营火速前往，协同作战。李必武同志又找毛主席商议，派出农民运动讲习所三百名学生军，驰援麻城，迅速平定了反革命暴乱。

农民在乡里造反，城里国民党右派和绅士们大哗，攻击农民运动“糟得很”。黄安县一个站在地主阶级立场上反对农民革命的人，跑到武汉，向李必武同志叫吐说：“农民搞的什么名堂，把黄安搞得乱七八糟！”李必武同志当即严词驳斥说：“我们的革命就是这样革法，你们说糟得很，我们说好得很！”那个人无言以对，只有狼狈不堪的离去。

一九二七年六月，在国民党右派加紧镇压湖北农民运动的时候，省农协举行了扩大会议，李必武同志在讲话中指出：“现在革命确实到了很困难的时期，可是我们要设法克服这些困难，就是打破困难的营垒”。大会之言驳斥了所谓农民运动“过火”的谬论，向全省农民指出：“此刻不是退让的时候，而是整齐我们的步伐，向敌人猛烈进攻。”会后，他还向各县农运干部指出：要警惕汪精卫搞突然袭击，把农民组织起来了，我们就会更坚强，就顶得住。鼓励大家，认清形势，坚定信心，坚持斗争。

四

一九二六年冬至一九二七年春，蒋介石加紧勾结帝国主义和封建买办势力，准备发动反革命政变。毛主席代表我们党的正确路线，坚持无产阶级的革命领导权，联合国民党左派，发动广大群众，已开了大规模的反蒋斗争。

李必武同志利用他担任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常委、主持省党部工作的有利条件，为捍卫党对革命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同蒋介石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蒋介石为窃取革命胜利果实，把黑手伸向湖北，于一九二六年九月上旬任命了御用的湖北省政务委员会。九月下旬又成立了所谓湖北省临时政治会议，妄图拉拢李必武同志当委员，当即遭到李必武同志的坚决拒绝。为了揭露蒋记省政权的反动本质，十二月十日，他以湖北省党部的名义，提出《湖北最低限度政纲》二十一条，要求“民主政治之实现”，“切实保障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居住一切之自由”，“肃清贪官污吏，建设廉洁政府”，“尽力赞助工农组织之发展，并将工农生活之改善，所有军阀政府一切制度及干涉工农组织之苛律，一律废除”。一九二七年三月十日，李必武同志又以省党部的名义写信给省政务委员会，指出：“半年以来，除经广大民众直接打倒之土豪劣绅外，迄未见贵会依法惩办一人。所谓依法审判，亦仅徒闻斯语，是政府方面对于土豪劣绅过于优容，适予彼辈以反动之机会，因之阳新、监利、汉川、麻城、夏口、钟祥、汴江等县捣乱党部，焚杀党员之惨案，遂接踵而起，风声所播，蠢蠢思动者，乘机暴发，将更濒于不可收拾之势。此种责任，应由政府负之。”在广大群众面前，公开揭露了蒋记省政权的反动面目。四月十四日，蒋记省政权黯然收场，由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占优势的湖北省政府正式成立。李必武同志根据党的决定，担任省政府常委兼农工厅长，主持省政府的工作，有力地推动了全省反帝反封建革命运动的发展。

当时，蒋介石实行新军阀的独裁统治，极力破坏革命统一战线，掀起反共逆流，在南昌另立右派中心。二月二十四日，武汉三镇二十万群众举行要求民主、打倒独裁的反蒋大会。会上，董必武同志号召大家，反对个人独裁，实行民主，‘打倒一切封建势力，矛头直指独夫民贼蒋介石。三月十日至十七日，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汉口举行。会上，毛主席、董必武、吴玉章、林伯渠、恽代英等同志，团结国民党左派，坚决打击右派，通过了各项反蒋的重要提案，撤销了蒋介石的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组织部长和军事委员会主席等职务。三月十二日，我党领导武汉一百万群众在阅马场举行了盛大的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两周年大会。董必武同志向大会提出的“厉行总理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继续努力国民革命”，“恢复民主集中制，反对个人独裁”，“铲除党内党外的一切反革命者的恶势力”，“查办暗中和帝国主义联络和军阀谋妥协者”的重要提案，获得广大群众热烈鼓掌通过，会内会外汇成一股强大的反蒋怒潮。三月二十日，武汉国民政府冲破蒋介石的阻挠破坏正式成立，反蒋斗争取得了一次重大胜利。

四月初，董必武同志在省党部的一次会议上，作了《我们目前两大斗争》的报告。他指出：“目前革命势力的发见，而引起国际间的重大变化，同时因国民党内被封建势力把持，而引起国民革命的危机”，“虽然在形式上是两个问题，而实际上是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要反对帝国主义，就要排除妥协分子；我们排除妥协分子，就是反对帝国主义。”他强调说：“张作霖也表示与蒋介石合作了！只希望蒋介石打击彻底派，打击农工群众，同时当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生命，并且帮助帝国主义打击反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帝国主义“利用蒋介石的方法，与利用张作霖、孙传芳是一样，而蒋介石甘愿受他们的利用，也与张作霖、孙传芳是一样”。一针见血地揭穿了蒋介石充当帝国主义走狗、新军阀的反动本质。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武汉地区的反蒋怒潮更加汹涌澎湃。董必武同志主办的《楚光日报》，旗帜鲜明地提出“打倒蒋介石！”“反对帝国主义出兵华北武装干涉中国！”的战斗口号，并且指出：“目前中国革命的出路：（一）打倒蒋介石（二）铲除封建势力（三）打倒土豪劣绅（四）实行农工政策（五）拥护政府最近对土地问题的新策略（六）打倒帝国主义——反对经济封锁反对出兵华北”。董必武同志积极响应毛主席关于武装保卫革命的号召，坚持不屈不挠的斗争。七月中旬，根据党的指示，董必武同志毅然辞去了湖北省政府委员和农工厅长的职务，并严词痛斥了汪精卫的反革命罪行。

由于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党中央占了统治地位，我们党对蒋介石、汪精卫的叛变，不能组织有效的抵抗，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遭到了失败。白色恐怖笼罩武汉三镇，许多共产党员和工农群众牺牲在反革命的屠刀下。董必武同志耿耿丹心忠于党，千难万险只等闲，继续坚持革命斗争。在汉口租界里，罗亦农同志向他传达了“八七”会议的决议。董必武同志在毛主席“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光辉思想指引下，积极投身于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

一九二七年的冬天，董必武同志根据党的指示，化装成水手，乘船东下，离开了战斗多年的武汉，踏上了新的革命征途。董必武同志早期在武汉地区的光辉战斗历程，在我们党的光荣历史上写下了永世不朽的篇章。